

尼日利亚的危机

国际社会关注该国战乱与饥荒

飞进山区,一个“三不管”城镇坐落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

你在这里能看到的只有一片开阔的荒芜。这里没有地平线,只有炙热的沙土,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风扑面而来。这里没有绿色,只在地下水溢出的地方生长着斑驳的苔藓。除此之外,全部是尘土,时常有被烧毁的村庄映入眼帘。

这就是长达8年多的博科圣地极端主义冲突所采用的焦土政策遗留下来的痕迹。去年,全世界开始关注到这里的惨状,尼日利亚军队也开始驱逐博尔诺州、尤比州和阿达马瓦州据点内的叛乱分子。

随着幸存者撤离该地区,人道主义工作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数百万人生病或几近饿死,并有无数人已经死去。“我们看到走出来的人们的状况,才知道危机有多严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尼日利亚健康项目负责人 John Agbor 说。

虽然确切数据难以统计,但有媒体报道,联合国发布警告称,在尼日利亚博科圣极端组织活动区域将有8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多数是儿童。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OCHA)表示,这3个州中约有510万人营养不良,50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并且未得到治疗,到6月预计将有7.5万人死亡。在博尔诺州,120万人涌入首府迈杜古利市,使这里的人口数量在数月就翻了一番。

OCHA 驻尼日利亚发言人 Orla Fagan 称,“如果我们没法为他们提供食物以及营养品等方面的援助,明年将有12万人死去,其中大多是该孩子。这是非洲大陆最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一直被忽视。而发生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灾难同样糟糕。”

食物、水和卫生设施严重匮乏,粪便难以清理,这些贫民区可谓是滋生疾病的温床。这里陷入了死循环,营养不良的儿童更易被疾病感染,并且无力抵抗。而另一方面,麻疹和疟疾肆虐,脊髓灰质炎死灰复燃。

法国巴黎无国界医生组织儿科专家 Marco Olla 表示,目前,尼日利亚该地区的儿童死亡率已打破纪录,是紧急阈值的“2.3、4倍”。疟疾已经是第一杀手,导致了死亡总数的一半,但现在,严重呼吸道感染和腹泻也在争夺榜首。

虽然难以排列人间惨剧的等级,但所有人都认为这里是非洲大陆目前最不幸的地区之一。“很多人真的非常不幸。”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紧急项目的 Jorge Castilla 说。但诸多未被识别出的问题和资金缺口,让救援人员难以实施救援,需求太大,物资太少。

动荡不已

尼日利亚是一个被一分为二的国家:石油储量丰富的基督教南部地区是非洲最富裕地区之一,相反穆斯林人口聚集的北部地区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区域。这里的受教育率盘踞在20%~30%,而女性的比例更低。大量年轻人没有受过教育并毫无前途,因此易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博科圣地出现于2009年前后,全名是人民致力传播先知的教导及圣战,而博科圣地在尼

“2017年将是十分艰难的一年,可能明年将有一点恢复。”

难民营中的孩子在安全地玩耍。

图片来源: ANDREW ESIEBO



日利亚北方豪萨语的意思是西方教育是罪恶的,更为人所知。该组织的规模尚不被外界所知,但具有自己的教条和残酷的法规。

起初,该组织的袭击较为零星,但之后规模不断扩大。例如,据《每日邮报》报道,卫星对比图显示,尼日利亚北部城镇巴加在经过博科圣地的血腥屠杀后,完全变成了一座死城。大片居民楼和校舍消失,预计超过2500余人不幸遇难。

2015年,新当选的尼日利亚总统 Muhammadu Buhari 宣布对叛乱分子进行围剿。虽然战争极为残酷,但包括迈杜古利市在内的大部分地区重回政府军的控制之中。

在极端组织的统治下,村庄被烧毁,农民被禁止种庄稼。近日,世卫组织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该地区35%的医疗设施被叛乱分子毁掉,另有30%被破坏。数年来,妇女没有接受产前检查,儿童也难以接受医疗和免疫,这也是疾病暴发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

一些家庭连夜逃走。“你要么被饿死,要么被博科圣地杀死。”难民营里的一位父亲说。他希望有一天能回到自己的土地耕作。“虽然会挨饿,但至少是安全的。”

恶性循环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食物发放点,工作人员在为儿童体检,通常绿色代表营养充足,黄色是温和的急性营养不良,而红色则是严重急性营养不良(SAM),这也是最危险状况,如果不进行治疗,死亡率约为1/5。

能来接受检查的儿童是幸运的。如果SAM患儿不能进食,会被立刻送去急救,能进食的则

被送到门诊就医。儿童还能在这里服用维生素A和除虫药阿苯达唑。每位母亲还能获得一些装有牛奶和花生的包裹,以治疗营养不良。每8周,工作人员会对儿童进行复查,母亲也能获得更多食物。当达到绿色区域后,儿童便能离开该治疗项目。该项目成果显著。Porter 表示,8周后,85%的儿童康复。

即便如此,该地区面临的营养不良问题仍旧显著。而营养不良和感染疾病结合后尤其致命。营养不良能破坏免疫系统,从而使患者更易感染疾病,甚至死亡。反之,生病会使儿童不愿吃饭和喝水,从而加重营养不良。感染同一种病后,SAM 患儿死亡率是营养充足孩子的9倍。

而在难民营的一个帐篷里,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在接受卫生工作人员的询问:孩子病了多久?症状是什么?这位母亲一一作答。片刻后,工作人员给出了诊断结果:疟疾。在另一个帐篷里,她领取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联合用药(ACT),对抗继发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止痛药。这位母亲走后,立刻有人进来,孩子的症状依旧是疟疾。

虽然基于耐药性考虑,医生只有采血和快速检测(RDT)后,才能为患者使用ACT。但这里的卫生工作者不具备这些条件;这里的RDT已经过期。由于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尼日利亚的疟疾患者数量激增。而且,无家可归的人通常住在户外,就暴露在携带该病毒的蚊子眼前。通常,针对疟疾较好的干预手段是:使用蚊帐,在室内喷洒杀虫剂,以及在3天内快速诊断和治疗。但在危机中,这些稀松平常的手段变得遥不可及。

而营养不良又让事情变得更糟。美国疾控中心疟疾和寄生虫疾病项目主管 Larry Slutsker 表示,虽然人们尚不清楚营养不良和疟疾之间的联系,但毋庸置疑,那些严重营养不良的疟疾患儿的死亡率更高。

遥遥无期

尼日利亚的冲突似乎没有尽头。实际上,联合国预测,在未来几个月局势可能更加紧张。博尔诺州的大部分地区仍一片荒芜,激烈的战斗还在持续。

而且,救援工作仍资金不足。2016年,联合国计划为这3个州募集4.84亿美元,但最终仅筹集到54%。健康项目的情况可能更糟糕,仅收到申请金额的22%。2017年,联合国要求募集10亿美元,现在看来情况不容乐观。

而博尔诺州只是全球数个遭受极端组织威胁的地区之一,还有其他地区也需要这些为数不多的救援经费。

此外,人们还想知道该地区遭到忽视的原因。一些人推断,原因是这里没有石油,因此对西方的战略吸引力不足。而且,北部贫困的穆斯林人口从未出现在其他人的雷达画面上,该国政府也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冲突不断扩大,再也难以忽视。“如果不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可能没人知道博科圣地。”而且,这里的冲突呈本土化,不像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那样走出国门。

“2017年将是十分艰难的一年,可能明年将有一点恢复。”Agbor 说,“但只有驱逐了叛乱者,人们才可能重返家园。” (张章编译)

驱逐有损非法移民健康

压力和恐惧带来的持续效应开始显现



2008年美国爱荷华州大规模移民搜捕对该州拉丁美洲社区健康造成持续影响。

图片来源:David Lienemann/NYT

逮捕了近400名非法入境的移民工人,最终将其约300人驱逐出境。

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流行病学专家 Nicole Novak 及同事检测了5.2万余名爱荷华儿童的出生证。他们发现该次突袭后,该州拉丁裔母亲诞生体重较轻婴儿的比例比此前高24%。非拉丁裔白人婴儿体重则无明显变化,表明拉丁裔人口受到该次事件的特别压力。

“这些是诞育美国公民的女性,这种压力将会影响他们的健康和生存几率。”纽约州立大学医学社会学家 Kate Strully 说。较低出生体重与

发育延迟、行为问题以及慢性病风险增加相关。一些研究表明,极端压力可改变一名儿童的DNA,改变其基因表达,并会传递给后代。

Strully 与同事正在检测美国数百万名婴儿的出生证,以了解当各州实施法律针对非法入境的移民时,类似的出生体重模式是否会重现。比如,亚利桑那州让警官核实他们制止、拘留或逮捕对象的移民身份。

对一些研究人员来说,这个话题是很个人化的。在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非法入境的学生正在记录他们所在社区移民的情绪和精

神挑战。“这是让非法入境的学生做出一些反馈。”研究工程的一个团队领导人 Josue De Luna Navarro 说。

像合作者一样,De Luna Navarro 拥有暂缓遣返青少年(DACA)的法律地位,这让非法进入美国的青少年拥有暂时居住权。“我们总是处于飞行中或飞行模式中。”De Luna Navarro 说,“我们从未真正有过喘息的机会。”除了担心被遣返出境以外,DACA 学生必须应对联邦财政补助、贷款和一些工作的不可获得性。

尽管如此,对非法入境者的直接研究仍存在困难。出于伦理原因,多数研究人员不会问及研究参与者的公民身份,很多移民会在寻求医保或进行政府登记时犹豫不决,这限制了相关公共数据。

不过,境遇有时会提供自然的实验。2013年,美国政府移民机构在密歇根州沃什特兰县进行了一次突袭,当时社会学家 William Lopez 正在进行一项健康研究。密歇根大学的 Lopez 说,突袭之后完成调查的151人比325名突袭之前已经完成调查的人的整体健康状况更糟糕。很多人说在突袭之后,他们害怕离家寻找食物与医疗护理,并呈现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症状。

一些研究人员担心,特朗普的政策还会扰乱长期以来进行的移民健康研究,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加州中部地区进行的一项研究。“17年来,该研究已经跟踪了农场工人的600名儿童,他们大多数是墨西哥人,其中很多人并非合法居民。”该研究牵头人、伯克利分校神经生理学家 Brenda Eskenazi 说。

去年,研究人员首次将与被驱逐出境的恐惧感相关的问题纳入访问中。他们还开始散发小册子告诉参试者如果有联邦机构来到家门口时他们所拥有的权利。Eskenazi 说:“我们确实非常担心这些人。” (晋楠编译)

科学线人

全球科技政策新闻与解析

欧盟科技人才向西欧倾斜



波兰科学院

图片来源:Charlie/flickr

近日,一项新分析认为欧盟人才正从东欧流向西欧。而且,在顶尖的东欧研究专家开始进入西欧高级研究机构后,他们的同事和学生回国后跨境交流反而更少了。美国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专家 Paul Nightingale 说:“这种效果让我十分震惊,同时这些发现也令人担忧。”

这个分析基于一个自然实验。2004年,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共和国等10个国家加入欧盟,这使得东欧国家的人们可以更容易、方便地在西欧找到工作,并在那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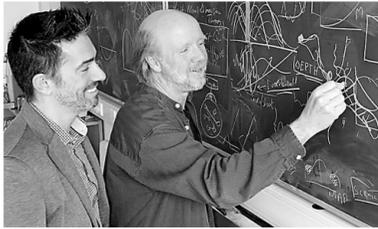
于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默塞德分校计算社会科学家 Alexander Petersen 以及同事,利用欧洲内部工作变动的政府数据库,推断出欧盟成员国扩充对科学流动性的影响。该数据库记录了诸如医生、土木工程师等这种在新的移居国家需要专业认证的高熟练技能人才在各国之间的流动情况。

尽管多数专业人员希望能够在相邻国家工作生活,以便于往返,但是离开东欧奔赴西欧的人员比例在2005年后从5%攀升至29%,人才流失的情况显而易见。因为科学家并不需要政府认证,所以他们的信息并没有记录在政府数据库中,但 Petersen 认为科学家的移民趋势与专业人员相近。

其他专家也同意他的观点,欧洲科学秘书长 Peter Tindemans 说:“肯定有不少科学家都走了,因为西欧的大学普遍拥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毕竟科学家倾向于去那些拥有更好条件完成科学实验的地方,并且那里资金也相对充足。”欧洲科学是一个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研究人员联盟。

Petersen 和同事还对1996年至2012年间发布的科学论文进行了统计,主要工作是着眼于那些涉及国际合作的研究论文作者的从属关系。2004年后,东欧成员国的国际合著论文发表数量成比例下降。相对而言,这个比例在老成员国中得到增加(该比例的计算方式如下:在每一个合著者所在的国家,合著的论文都被当做国际出版物;但如果论文的作者都来自一个国家,那么这篇论文在这个国家则被当做非国际出版物)。例如,在波兰,国际合著论文的比例在2004年为33%,但这个比例在2011年猛跌至28%;反之,在英国,同样时间内的比例则从28%攀升至43%。(唐一尘)

荷兰试点经费分配新体系



Johan Bollen(左)和 Marten Scheffer

图片来源:Ingrid van de Leemput

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为:申请经费是个费力的活。写一份好的申请书需要数月,但申请到经费的几率却很“骨感”。而且,资助机构也要花更多时间和金钱审查堆积成山的申请书。

因此,两位研究人员建议改变现有经费申请模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计算机学家 Johan Bollen 提出“自组织经费分配”(SOFA)模式。在2014年首次发表该模式时,人们对其表示怀疑,多亏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生态学者 Marten Scheffer 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主人开始对此感兴趣。荷兰议会去年就要求该国主要科研经费机构——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启动SOFA试点项目。

Scheffer 和 Bollen 表示,目前经费竞争日益激烈,对青年学者尤为如此,而现有的同行评议体系十分无效且不公平,因为一些科学家得到大量经费,而一些人什么也没有。

在新体系中,科学家不需要再进行申请,而是每年平均分配预算,但他们必须捐赠固定比例的预算给那些他们尊敬或成果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体系不是基于委员会审查,而是大众智慧。”Scheffer 说。

Bollen 和同事利用计算机模型检验了该体系,发现如果科学家将分配到的50%的钱捐给那些自己引用了论文的作者,那么研究经费大致与现在机构的分配相近。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信任。为了进行确定,Scheffer 和 Bollen 表示,荷兰是个完美的演示场地。去年,该国众议院要求NWO启动该项目,但迄今为止,该机构并非十分热衷。“NWO 愿意与科学家共同探索SOFA,但也应考虑实用性的实际情况。”NWO 发言人说。(张章)